

编者按：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式，数字经济应运而生，迅速崛起。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9月4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致辞时指出，我们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助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预期，数字经济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培育新优势、注入新动能，提升我国产业链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让我们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当前世界经济受到疫情冲击，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互融合，以5G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重要推手，并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未来将催生一大批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目前，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了全国GDP的1/3左右，未来5年5G商业推广应用，可以直接拉动GDP10万亿，间接拉动GDP25万亿，同时直接创造300万个就业岗位。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数字经济将对未来中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面向未来，要发挥数字经济在新一轮经济周期中的引领作用，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引导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形成政府与企业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合力。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和攻关力度，解决基础软件、高端芯片、核心元器件等关键核心技术问题。

近年来，我国数字技术发展迅猛，向生产生活领域和公共治理领域广泛渗透，数字经济蓬勃发展。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1/3，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数字技术将构建新的产业生态，形成更强大的创新活力，数字经济将引领新一轮经济周期，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一段时间以来，线上零售、线上教育、视频会议、远程办公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不仅保障了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和社会正常运行，也丰富了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有效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新一代数字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使得数据日益成为产业发展核心生产要素，三次产业的边界日趋模糊，产业结构升级将更多表现为数据要素投入带来的边际效率改善。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从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到销售服务全流程数字化，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和供需精准对接，将为转型升级开辟新路径。

本期推出“数字经济”专题，有针对性选取相关文章，讨论数字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主要特征、表现形式和发展态势，了解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分析我国数字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建议。希望能为盐城市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思索和方向。其他栏目的文章也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 · 数字经济

- 02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研判
- 06 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第三波全球化
- 09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业融合研究
- 11 数字经济推动“长三角”高质量发展
- 12 数字经济：在众多“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政坛经纬

- 14 为什么土地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经济纵横

- 17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趋势
- 19 盐城枢纽变身记

悦读时光

- 封三 激发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内动力

主 管：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科

主 编：黄兴港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王智芹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51431986

邮 箱：417967615@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微数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盐城银河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0年9月14日

印 数：6400-6600

数字经济新业态 新模式发展研判

新业态新模式是以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为牵引，以数据要素价值转化为核心，以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为方向，经产业要素重构融合而形成的商业新形态、业务新环节、产业新组织、价值新链条，是关系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因子，具有强大的成长潜力。受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效应倒逼，数字技术与各行业融合“渐入佳境”，以在线办公、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持续迭代、加速成熟，“无接触”“宅生活”“云消费”成为数字生存新常态，正适应、引领、创造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新需求，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近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通过制度集成式创新，将进一步激活消费和就业市场，更好地释放数字化在经济各领域的创新效能，促进经济快速恢复、加速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发展机理

1. 技术驱动：数字技术赋能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以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是新业态新模式迭代升级的关键驱动力，促进数据融通、资源流动和价值共享，实现配置优化、效率提升和社会协同。

云计算实现网络数据的便捷访问和计算资源的按需共享，提高了部门间的协同能力，降低了数字资源管理的技术门槛。大数据实现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促进数据资源向有价值信息的转化，已在优化生产、降低能耗、精准营销等方面开展大量应用服务。

边缘计算使数据实现本地化处理，减少云端传输时间，实现更快速的数据处理分析，提高应用服务效率。人工智能赋予机器交互学习的能力，在智能制造、药物研发、无人驾驶等领域融合衍生出丰富的行业应用场景。数字孪生促进物理生产与数字制造的互联、互通、互操作，帮助制造系统实现敏捷分析、全局优化和智能决策。

2. 疫情倒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触发数字化生存机制。疫情期间，全民居家带来的生存压力空前，倒逼人们借助数字技术将各类社会关系迁移到线上的数字空间，促进数字化生存发展，加速全社会数字化进程。

生活方面，电商平台保障了生活必需品和防疫用品的充足供给，直播带货、微经济拓展了“宅生活”的购物渠道，无接触配送极大改善了疫情期间外出受限带来的诸多不便。工作学习方面，视频会议、在线教育等平台为人们在线上搭建了新的交互场景。休闲娱乐方面，越来越多的电影、电视节目和原创内容开辟了在线播放专区，网剧、网络电影、网综成为人们休闲放松的文娱大餐。

信息传播方面，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内容分发等数字媒体已替代传统纸媒，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流方式。社交方面，过去单一的基于日常生活的熟人社交转变为基于微博、微信、Twitter等软件的网络社交，进而衍生出陌生人社交、兴趣社交等新型社群。社区管理方面，无人机巡逻喊话、视频通话、智能安防等方式快速推广，有效保障了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

3. 需求升级：消费者主权意识升级激发长尾效应。消费者的需求升级，既不再满足于标准化商品，希望在

商品的设计和生产中注入独有观念和个性，又更加重视产品及配套服务的双重品质。

一方面，买卖双方信息更加均衡。借助电商平台、第三方测评等渠道，消费者掌握了透明可靠的商品信息，商家通过掌握消费者的画像信息，提供更为精细化的增值服务，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场景化、新颖化的长尾需求。另一方面，人们的消费需求受收入、消费理念等影响呈现两极分化态势。高收入人群追求时间、体验、品牌优先，更加关注全生命周期体验和实时消费场景等内容；下沉市场中真正的“大众需求”则更倾向于追求实用，体现出消费升级道路上的理性回归。

4. 本质追求：价值追求引领企业变革创新。在经济规律性减弱的态势下，企业主动寻求数字化手段来突破发展困境，依靠数据、信息、技术和知识等新要素来挖掘新模式、新价值、新商机。WEF《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供应链的影响》指出，数字化转型使制造企业成本降低17.6%、营收增加22.6%，使物流服务业成本降低34.2%、营收增加33.6%。特别是在此次疫情中，数字化基础较好的企业快速实现复工复产，并围绕疫情带来的新需求快速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有效实现“危中转机”。

比如，一些装备企业依托信息共享平台，对市场需求、产能、供应链配套等情况进行监测预警，实现设备、物资和物流的高效匹配对接，推动上下游、产供销协同，对于可能停产断供的关键环节提前部署、柔性转产、共享产能，保障了口罩、医疗设备等防疫重点物资供给。经“新冠”一役，越来越多的企业直观、深切地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优势，开始更加深入地谋划与发展基础适配的转型路径、方法和模式。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家不断思考的命题，也是推动社会创新、企业变革的不竭动力。

二、主要特征

1. 从发展理念看，绿色共享主线贯穿。数据驱动的新型经济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绿色经济。对于汽车、住房等产业链条环节多、产品生产周期长的产业，信息传导滞后可能导致产业链上游的产能过剩。新业态新模式则具有数字化程度高、生产周期短、消费门槛低的特点，不会出现明显的边际成本递增，可能会随着产值规模的扩大，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越来越小，这将缓解资源和环境约束的压力，也不容易导致供给过剩。

此外，新业态新模式不仅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益，也同时实现了清洁生产。如，共享生产、共享出行等平台将社会闲余资源以集约共享的方式统一调配，提高了存量资源的利用效率。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在线办公

等应用的普及，极大地减少了城市交通出行流量，形成绿色可持续的数字生活新模式。通过分析用电大数据改良产品设计，实现源头上的能耗降低；通过柔性生产、个性定制等生产环节重塑，实现投入产出的精准控制，避免供给过剩造成的资源浪费。

2. 从要素投入看，数据驱动创新发展。随着网络全面普及、计算无处不在、要素广泛连接，源源不断的数据得以产生，数据要素打破了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有限性的供给束缚，已成为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重要驱动力。数据可复制性强、迭代速度快、复用价值高、无限供给的特点，决定了数据规模愈大、维度愈多，数据的边际价值就愈高。

数据融入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的功能开发中，推动了信息产品和服务的跨越式创新；数据融入电子商务、金融等业务中，通过对数据分析挖掘进行用户画像，衍生出精准营销、广告推送、信用借贷、个人健康管理等新消费服务；数据融入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的社会治理中，推动形成了数据驱动决策的数字治理新模式，普惠社会大众。数据流带动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将不断突破地域、组织、技术的边界，全面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水平，从而有效促进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3. 从参与主体看，跨界融合主体多样。在经济发展方面，跨界融合是业态创新最直接的路径，企业间跨界协作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引入新的经营理念、技术、方法手段，运用现代化工具激活和优化配置资源，进而创新商业模式，重塑价值链。在社会治理方面，政府侧重于多主体协调和制度保障，平台企业、社会组织因掌握大量行业数据且兼具市场的灵活性，可以在政府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的领域对政府治理手段形成有效补充。此次疫情防控中，平台企业快速上线疫情地图、健康码等产品，借助自身运营物流渠道协调各类资源，在支援前线、后勤保障、服务民生、资源赋能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这一模式的成功范例之一。

在民生保障方面，微经济、短视频等通过赋能大众，创造出千千万万个灵活就业岗位，以“大众广泛参与、碎片资源共享、生产消费一体化”为核心价值的新个体经济得以快速普及。如，金融理财、育儿教育、医疗健康、艺术设计、生活服务等领域的“新个体户”、副业创新人员大量涌现，来自最广大个体主体的供给能力、创造能力被唤醒，凭借个人主体对个性化和高端化的长尾需求的深度挖掘，现有的产品与服务得到不断丰富和细化。

4. 从价值实现看，价值溢出效应突显。新业态新模

式借助平台和网络快速实现了技术更新、模式扩散与价值增值，带动上下游行业共同发展，实现价值产出高持续性的循环倍增。在就业方面，电子商务、网约车、外卖、快递、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增加了大批就业岗位。以电子商务为例，据麦肯锡测算，每100元网络零售，其中39元为新增的消费支出。电子商务产业的衍生效应直接带动了广告、营销分销、支付、仓储、物流、快递等相关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其中，快递行业连续5年实现超过27%增长，50%以上的收入来自电子商务。越来越多的人依托社交平台、自媒体平台、创客平台等渠道分享知识、兼职创业，其结果是新产品、新服务、新应用、新场景的不断涌现，产生广泛的溢出效应。

三、表现形式

根据作用方式的不同，我们将新业态新模式分为四大类15个小类。其中，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数字化治理等侧重激活消费新市场；产业平台化、数字化转型、“虚拟”产业集群、无人经济等为壮大实体经济带来新动能；自主就业、微经济、多点执业等侧重开辟消费就业新空间；共享生活、共享生产、共享生产资料、数据要素流通等侧重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

（一）发展态势

1. 移动化、平台化、智能化基础支撑架构不断夯实。随着移动智能终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快速渗透，计算和服务平台实现集中统一，以移动智能终端为载体、云计算平台为支撑、智能服务为内容、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架构加速形成。多领域企业纷纷参与数字生态建设之中，通过嫁接软硬优势资源，开展各类端到端服务的有益探索，未来有望带动一批新的产业主体、应用平台和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

例如，京东物流推出了智能拍照工业手机，解决快递员上门揽件时包裹测量和数据录入的问题。施耐德研发的Wiser无线智能家居系统，可以让消费者通过手机远程操控环境调节、照明控制、能效管理、遮阳管理、人身安全看护、家庭安全看护、场景联动等功能，真正做到在千里之外，掌控居家环境。硬终端、泛平台、软服务的一体化加剧了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竞争，将吸引更多服务主体加入，衍生出多元化商业模式。

2. “产品+内容+场景”深度融合新形态日益丰富。线上购物时代已经到来，便捷的购物场景、高效的购物环节、碎片化的购物时间、快捷的物流配送，随时随地剁手下单已成为消费者的日常购物习惯，产品已演变成被内容、场景所包裹的一种体验。成功的互联网产品往往是“内容为王”，内容的来源、组织、呈现方式和

质量对产品的运营效果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通过满足用户获取信息、打发时间、消费决策和深度阅读等内容消费需求，可以提升产品的活跃度，扩大网民对品牌的认知度。通过将产品嵌入生活场景，用产品卖点触及消费者的痛点、痒点，引起情感共鸣，激发购买欲望，从而完成商业目的。例如，喜马拉雅将音频接入车载智能终端，实现音频收听场景的顺延，达到优化用户体验、增加用户黏性的目的。

3. 以数转型、用数管理成为价值创造主攻方向。数据要素的崛起和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也推动企业管理模式、组织形态的重构。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企业的数字积累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探索由数据驱动的服务模式转型、组织管理变革以及发展战略制定等新模式，实现决策方式从低频、线性、长链路向高频、交互、短链路转变，组织形态从惯于处理确定性事件的静态组织向快速应对不确定性的动态组织转变，管理对象从进行重复性的劳动经济人向独立自主、具有强烈自我价值实现需求的知识人转变。

4. 多方参与、资源共享、价值共创新生态加速形成。产业链全球化对企业的供应链韧性、全市场流程把控、全产品周期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企业需更精准定义用户需求、更大范围动态配置资源、更高效提供个性化服务，发展远程诊断维护、全生命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精准供应链管理等新服务模式。

新业态在新发展理念的作用下，更加注重由创新、绿色、服务等高质量要素驱动，并在价值链各环节深挖利益空间，颠覆旧有的商业模式，呈现产品快速迭代、用户深度参与、边际效益递增、创造消费需求等特征。同时，企业与员工、客户、供应商、合作伙伴等利益相关者互动更加紧密，共享技术、资源和能力，实现以产业生态构建为核心的价值创造机制、模式和路径变革，围绕数字化底层技术、标准和专利掌控权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二）面临的问题

1. 底子薄，技术应用能力不足。疫情期间，线下生活向线上迅速迁移，暴露出供需双方数字化水平不足的阶段性问题。一方面，供给方的技术能力储备不足。由于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受限，全国范围的复工复产多采用线上方式，如此大规模、高密度的线上并发，对于平台企业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需求方的数字化应用能力不足。对于不熟悉互联网、不会用智能终端的人群，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数字化生活带来的不是便捷，反而是更高的生活技能门槛。疫情期间，无论老师、学生、

家长，还是老人，都被裹挟到数字化生存时代，如何提升全民的数据管理能力，让中老年人也能拥抱和享受数字生活，是政府部门和科技企业要着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 体验差，内容服务效益欠佳。疫情期间，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生鲜电商等领域尚未成熟的应用产品要应对突如其来大规模用户，技术、服务、管理面临多重考验。一是内容单一、稳定性差、交互性弱、信任感尚未建立。以在线教育为例，原创高品质的教育产品几近空白，由于没有线下学习的氛围，学生学习的专注度难以保证，家长对教学质量存疑。二是供应链韧性不佳、服务配套弱。以生鲜电商为例，疫情期间物资补给不足、配送延时、物不美价不廉、客服短缺等连锁问题大大降低了用户的服务体验。三是盈利模式不明晰，疫后留客成问题。随着居民的生产生活恢复正常，线上应用的刚性需求骤减，平台将面临用户数量减少、客单区域分散、客单单价降低以及购买频率下降等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盈利成为新业态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课题。

3. 乱象多，新兴领域监管不足。新兴领域是创新、资本、人才最为集聚活跃的地方，也往往是现行法规制度未能有效覆盖的“法外之地”，制度滞后于市场发展的空白期就是行业乱象爆发的高峰期。以灵活用工为例，企业“合法”规避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纳，看似降低企业成本，却抑制了劳动者灵活就业的积极性。

在新个体经济方面，直播带货作为当下的现象级风口，不断刷新销售记录、动辄破亿元的销量榜单，网红主播、企业大佬、基层干部、文娱明星争先恐后“上车”卖货，而产品质量差、售后服务无、不正当竞争等行业乱象层出不穷，将消费者权益立于危墙之下，行业的长远发展面临巨大考验。谁来监管、怎么监管、监管什么问题不解决，维护消费者权益、保障数据安全、建立信任机制等都无从谈起。

（三）发展建议

1. 改变观念，探索数字生活新方式。不断完善新业态新模式的配套监管制度，使绿色、共享的数字生活理念深入人心，并向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的方向不断演进，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倡导可依托网络居家办公的机构，在疫后常态化推广居家办公、错峰上下班、弹性工作等新模式，提升线上生活刚性需求，同时节约社会资源、缓解交通压力、提高劳动效率和人民幸福感。深入挖掘用户体验，不断拓展应用场景、丰富产品内容，深化盈利模式是新业态企业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

2. 通畅道路，加强新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加快部署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提高大数据、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区块链、北斗导航等应用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普惠服务能力，推动无人化、协同化、公用化、智能化数字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和共建共用。加大对低线城市及偏远落后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为新业态拓展下沉市场铺就信息高速公路。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把握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红利期，加快推进设备、产线、工厂车间等的数字化改造，加强网络、平台、安全三大体系建设，积极搭建面向细分行业的信息共享平台、中介平台、众创平台等，促进行业内、上下游、产供销的协同。

3. 因势利导，释放传统业态新活力。要将疫情期间涌现的好经验、好做法总结推广，因势利导更多传统产业“转危为机”。一方面，探索行业内的流程再造，通过深入挖掘行业痛点，用新业态新模式替代实现转型创新。以远程医疗为例，打通线上线下医疗平台，探索将日常复诊、轻微症分诊治疗、基础病开药调药转为网上完成，需检查化验、实施手术的重大疾病转由实体医院诊疗的新模式。另一方面，探索服务化转型路径。积极利用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新制造、催生新服务，加快培育发展服务型制造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

4. 明确底线，营造自由生长新空间。以不危及国家安全、不触碰扰乱市场秩序为底线，研究制定涵盖公平竞争、劳动就业、版权保护、算法公平等在内的数字治理规范体系，如将“互联网+”医疗相应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细化灵活用工人员的社保缴纳要求等，确保新业态、新岗位尽快进入法治化轨道。大力加强针对数字化弱势群体的信息设备供给、信息技能培训、信息消费补贴，通过减税降费、增加专项补贴、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针对性金融产品等方式支持和引导新业态扎根发展，不断缩小群体和区域间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科技福祉惠及全民。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免疫系统”的一次深度“体检”，是对政府、企业、个人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一次集体拉练。在此期间不断涌现的新业态新模式正是我国在这场考验中积累下来的“经济抗体”，要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各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风云诡谲的全球经济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2020年29期 中国计算机）

数字经济、智慧城市、 第三波全球化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2020 智慧城市峰会》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认为，智慧城市的核心是怎样把数字技术应用到城市的管理和服务中，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改善人民生活的质量。

以下内容根据黄益平演讲整理：非常荣幸参加智慧城市峰会，我分享的主题是 数字经济助推智慧城市建设。总体的判断是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在我的理解中，数字经济是建设智慧城市非常重要的基础构架之一，我会集中讨论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些现状和前景。



数字经济很快会进入爆发期

中国在数字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进展，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等领域国际领先，现在有可能即将进入爆发发展的前夜，原因有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展示出来的无接触交易的特性，我相信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和肯定；

第二，政府在推动新基建的建设，会为下一轮经济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

第三，政府在推动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我相信这方面会有很多的政策法规出台，会有利于数字经济的

发展；

第四，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快十年，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也是数字经济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在这个领域，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是 5G 技术的落地，这样我们数字技术的基础会有进一步发展；

最后，我国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一方面是老龄人口的占比会增加，同时劳动人口的占比下降，出现一定程度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几方面因素加在一起，我个人猜测，数字经济发展很快会进入爆发期，这对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宏观经济稳定器

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发挥了一些作用，我们知道在 2、3、4 月份，经济活动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经验、世界经验都表明，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最严重的就是“封城”。

隔离和“封城”措施当然对经济活动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法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巴斯夏提出了破窗理论，他举例说，有一家理发馆，一个小孩子扔了块石头把玻璃窗打坏了，这个事情单独看是负面冲击，有财产损失破坏，但是巴斯夏觉得，当这块玻璃窗户打破以后，店主人就要到卖玻璃的店订购一块新的玻璃，而这个卖玻璃的店可能要到工厂去进货，玻璃来了也要请工人安装，如果我们把这些后续的经济活动全部加在一起，有可能是对推动经济增长甚至对推动就业有正面效应的。任何一个负面的事情，如果从另外的角度看，也许有一些积极的意义。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巴斯夏的理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看到数字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称之为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举个例子说，在隔离和“封城”期间不能去采购，

也不能去餐馆吃饭，很多活动在线上活跃起来。2月份隔离政策最严格的时候，蚂蚁金服用支付宝的数据做了调查，发现2月份线下的餐馆业务量下降了70%，线上的业务量下降了40%，说明线上活动的下降幅度远低于线下活动。

综合起来，因为我们有线上的活动，使得总体的经济活动受到的冲击变得更加平和，这是我们说的宏观经济稳定器的含义。

电商、快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在宏观经济中的稳定器作用，我觉得在疫情期间表现得更加突出。很多经济活动在疫情期间实际是在不断地延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除了线上很多电商交易以外，数字技术其实可以把很多线下的经济活动联结在一起。

我们讲智慧城市，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物联网全部连在一起，这样才有高度数字化的管理和服务，但是这个活动本身是有很大难度的，需要很多的基础设施，也需要很多的落地技术手段。

过去这几年，移动支付在这方面闯出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从2017年开始二维码支付，线下很多小商贩都把二维码印在纸上直接收款，这样的活动看上去很简单，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发挥了很重要的功能，相当于把完全分散的个体经营户连接到一个系统里。

移动互联网或者是物联网体系全部移进来后，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今年上半年，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用支付宝线下二维码的支付体系做了一个研究发现，全国可能有将近1亿个个体经营户，二维码支付将很多人连载到一个系统上，这会为将来的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的发展提供非常好的基础。

通过码商的数据，我们发现全国个体经营户的业务在2月大概下降了50%左右，从3月份开始复苏，到6月底恢复到应有水平的80%。

过去看国外在大灾害之后会有很多金融服务的特殊需求，比如说地震台风一过去，很多人会跑到银行取钱，申请贷款，在中国，即便是“封城”四周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真正跑到银行取钱的人比较少，移动支付意味着钱已经在手机上，这就是数字技术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好的变化，一定意义来说，也支持了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还专门做了一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描绘了全国各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所谓的数字普惠金融，主要是移动支付、互联网贷款、线上的保险投资等一系列金融活动。

从2011年最早开始编制指数地图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比较发达的是东南沿海几个地级市，到了2018年，地区间的差异明显缩小，虽然最发达的仍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但是内陆地区都在快速发展。

我国金融结构的布局绝大部分是在东部地区，西部人少地多，金融机构的布局也相对少一些。但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不管你处在什么地方，只要有移动互联网，有智能手机，在线上有一个APP，就可以享受和全国其他地区老百姓差不多的金融服务，从数字技术支持金融来说，是非常好的反映，既支持了地区差异的缩小，就是一个普惠性，更重要的从智慧城市的概念来说是互联，就是所谓的智慧城市。

第三个数字金融的例子是大科技信贷。过去发展普惠金融比较难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小微企业规模比较小、数量比较大、生命周期比较短、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很难对它做金融服务。

大科技信贷，现在做得最成功的应该是网商银行、微众银行、新网银行三家新型的互联网银行，他们所做的工作好在什么地方？就是解决了金融体系当中金融交易最难解决的问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因为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的特征，往往不能有效地提供商业银行做信用风险管理所需要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完整的财务信息或者是抵押资产。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大科技信贷在疫情期间一直在放款，在持续地支持中小微企业，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发挥了很重要的宏观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普惠金融比较难做，有一系列的原因，但归根到底就是两条：一是获客难，一是风控难。大科技信贷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可以看两个方面的工具，一是大科技平台的优势，像蚂蚁金服、阿里巴巴或者像腾讯这样的平台建立了生态系统，对支持信贷，或者是提供金融服务，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是长尾效应获客，支付宝、微信支付用户量已经是数亿；第二是客户到平台会留下很多数字足迹，这些数字足迹积累起来，就成为了大数据，大数据可以实时监测谁在平台上借了钱，可以监测将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时可以支持风控模型分析，这是新的创新；第三是通过设计一些正向或者是负向的激励机制，加强还款管理。

大科技平台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做一个事情，因为生态系统是闭环的，所有人借款都在线上进行，这个时候平台有一定的约束力，可以通过正向负向的激励机制，鼓励你还钱，还钱了你的信用记录改善，将来可以做得更好。

大科技平台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做一个事情，因为生态系统是闭环的，所有人借款都在线上进行，这个时候平台有一定的约束力，可以通过正向负向的激励机制，鼓励你还钱，还钱了你的信用记录改善，将来可以做更好的事情，更多的事情，如果你不还款，在平台上的业务就会受到影响，通过这样的一些办法，一方面是使得过去这一段时间小微企业贷款支持了宏观经济稳定，更重要的是，使得普惠金融成为可能，普惠信贷成为可能，这是我觉得几个方面比较重要的发展。

我们也看到工业革命正在走向深入，第四次工业革命讲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新技术推动恰恰是做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至关重要的技术基础，我特别想说的是，5G技术的落地可能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智慧城市的建设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技术进步是数字金融发展的关键，数字技术对数字金融来说，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大科技平台，二是大数据，三是云计算，三者合在一起，推动着数字金融往前走，将来5G落地之后，我觉得金融服务会进一步的提升，对物联网包括一些自动驾驶、城市的管理会有革命性的改变。

最后一个因素，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过去在经济发展中经常提到中国的人口红利，主要是劳动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在不断地上升，人口的生产率在不断提高，所以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这是有道理的。

但是从2010年开始，劳动人口的占比在下降，老龄人口的数量在增加，两个合在一起，意味着将来的老龄人口增加，一系列社会服务要求会增加，但同时劳动人口占比下降，有可能使得劳动力成为短缺，对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生产、自动化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多。

不论是从企业、市场还是政府来说，我相信能替代劳动力、能自动化生产和服务的会得到大力的支持和推动，这也是为什么数字经济面临着非常难得的机会。

数字经济与第三波全球化浪潮

未来一段时间，数字经济可能会有很大的发展，我

们做一个更大范围的展望，数字经济如果真的大幅度发展，技术进一步发展，我甚至认为有可能最终会引领第三波全球化浪潮的到来。

新的全球化浪潮到来，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有一点不以为然，因为今天讨论的更多的是世界各国逆全球化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多。我们可能要跨越短期的一些发展，做更长远的展望，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历了两轮全球化的浪潮。第一波全球化浪潮是1850年左右，是工业革命八九十年以后发生的一场全球化浪潮，我自己解读在当时为什么会发生全球化，其实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善，成本一下子降低了，国际贸易和投资变得相对比较容易，交通通信技术的改善降低了成本，从而推动了贸易的全球化，当时全球化主要的载体是货物。

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一般认为是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把美元和黄金脱钩开始的，美元和黄金脱钩基本的含义是摆脱了金本位，摆脱了固定规律，世界经济走入灵活自由浮动的规律体系的年代，在金融里面有一个蒙代尔三元悖论，因为放弃了汇率的体系，使得跨境资本流动变得空前活跃起来，今天说的全球化就是第二波全球化，是从汇率体系的改变开始的，金融优化、全球化都是从那里面衍生出来的。第二波的全球化是政策改变引发的，主要的载体是资本的跨境流动，贸易也变得更加活跃，我觉得资本的特性可能更加突出。

现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5G技术落地可能会在将来引领第三波全球化浪潮，全球物联网也好，移动互联网也好，如果全球都连在一起，交换成本会大大降低，这种交换可能是货物的交换、资本的交换、知识的交换，最终可能主要的载体是数据。

这样的时代什么时候到来，现在不太好说，我觉得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经济的发展，最后可能会迎来的是世界进一步连在一起的可能性。要实现这样的愿景，需要克服很多政治、经济、技术方面的障碍。

(2020-8 黄益平：《2020智慧城市峰会》主题演讲)

(上接第11页)

改革，要释放人才的创新潜力。很多科研工作者在现有体制机制下潜能受到了制约。激发人的创造性，通过去行政化和引入市场化机制，建立中长期激励机制，调动大家的创新积极性。

第二个突破口是支持上市公司和行业龙头企业发展。长三角地区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上市公司，在数字经济方

面独领风骚，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这些上市公司，在行业当中发挥引领作用。特别是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支持创新创业活动，带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同时，将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技术广泛运用到各行各业，包括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带动长三角地区整体经济实力提升。

(2020-09-03 东方网)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 产业融合研究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经济产业与制造业等各种产业的融合，已经呈现了必然的发展趋势，从客观层面对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进行评价分析，发现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在此基础上探究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业融合发展趋势，以及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融合的效应都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总之，从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融合探究，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它不仅会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定性分析，还能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数字经济的现状进行量化分析和对比，最终实现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业融合。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的区别分析

(1) 对信息的依赖性更强

与传统的经济形式相比，数字经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于各种信息的高度依赖。可以说，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为互联网的经济发展。我国近几年来互联网经济飞速发展，促进了网络平台的完善，而这一个相对完善的网络经济平台就可以更好地完善市场信息，对于社会各行各业中的产业信息进行充分地展示，而数字经济则在知识与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化体现，及时地采用相对完善的网络信息，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开展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活动，而这些市场经济活动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发展需求。当然了，在这些活动的开展过程中，都是离不开互联网信息的支持，所以说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知识和信息的依赖性更强，它的发展依托知识和经济，这可以说是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相比的一个主要区别。

(2) 经济发展节奏较快

传统的经济形势往往会受到资源配置、市场信息以及信息传递渠道不完善、信息传递水平较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使得经济发展发生阻滞。经济发展持续不良就会加大市场间的恶性竞争，而恶性竞争又会加大经济发展的不良因素，这二者相互影响。但是数字经济的出现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可以减少资源配置信息

传递水平较低对于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的限制，能够从更高的层次、更为丰富的角度提供市场经济活动的各项信息，减少由于信息沟通不畅，或者是资源配置不合理而导致的经济发展受阻。由于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更具有逻辑性，所以数字经济可以尽可能地优化信息沟通与资源配置的时间，这就会使得市场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较大的系统效应，当然，这也是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的一个较大优势



(3) 全球化的业务拓展趋势

进入 21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然而，传统经济并不能够很好地满足现实当中经济全球化的各项需求。比如说在进行业务全球化的过程中，他们往往需要借助更多的交通工具，而这些较为复杂的交通方式，跨地区的配置就会很大程度上提高成本、浪费时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企业的资本流通，进而导致企业无法持续健康地发展。并且，这种传统的经济形式还非常容易使得国内的企业受到外汇的影响，一旦外汇对国内企业影响加大，就极易造成企业内部的财务风险。但是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会为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带来一定的便利，产生一定的改变。数字经济有着传统经济所不具备的强大的信息整合能力，这就使得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发展，可以对庞大的市场信息资源进行合理规划，以及进行详细分析，并且能够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在实现业务全球化的过程

当中，可以避免复杂的交通运输方式，节省企业发展成本以及时间，这样更加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真正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

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融合的趋势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经济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当然，这也为市场发展起到了指引方向的作用。因此，这就要求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融合，才能够更好地促进传统经济再现生机。在传统经济影响下进行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它主要是以文化教育和传媒作为主要的融合手段。但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出现，产业融合的发展趋势和发展速度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逐渐朝着数字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就目前我国产业融合趋势来看，在进行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往往会呈现出下降的发展趋势，所以说在互联网经济下进行产业融合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数字经济为背景的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更好地为市场融合提供指引方向。

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融合的效应分析

(1) 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融合的成本约束效应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经济要想得到立足就必须进行发展模式的变化，对此，要积极促进数字经济对于产业融合的影响，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增大产业融合的效应。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融合，可以有效改变企业的成本和效益，可以说，这是企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场重要变革。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融合，可以更好地将数字信息技术的优势发挥出来，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同时还可以减少生产成本的投入。可以说，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融合，可以起到很好的成本约束作用，它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还可以节约企业进行扩张过程当中时间成本。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融合，可以避免传统企业在资源利用上的排他性，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而这种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就可以使得二者进行直接交易，降低交易过程当中成本。而另一方面，在数字经济特征的影响下，企业开展各项交易行为，可以大大减少无用的交易时间，保证时间利用的合理性。

(2) 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融合的组织优化效应

组织优化就是提高企业内部组织的适应性。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融合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产业的融合需求，对企业内部的组织框架进行调整，进而带动市场发展需求，使得市场的需求变得更加丰富多样。而面对这种状况，要想更好地实现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业融合，就必须优化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组织结构，这

样才能够使得企业融合的双方能够相互适应，大大减少由于组织结构不同而引起的矛盾。所以说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的优化是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融合过程中最明显的特征。由于在进行产业融合的过程当中，往往包括横向融合和纵向融合，因此，在管理的过程当中，可以采用扁平化的管理方式，通过建立一个扁平的管理机制，使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主动地把握市场发展的动态，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指明更好的发展方向。可以说，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融合，不仅会对企业内部的组织形态产生影响，还会对企业外部的结构组织产生较大影响，影响企业原来的发展方式，会对企业横向管理的管理模式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使得企业信息传递速度加快。

(3) 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融合的市场垄断效应

虽然说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产业融合，相较于传统的经济发展形势来说具有更多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发展背景下仍然会存在市场垄断现象。由于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自身存在差异，所以这两种垄断也是存在差异的。传统经济的垄断往往发生在资源上，而数字经济的垄断则是以数据信息为主。由于全球已经步入了信息化发展的新时代，大部分的产品都是数字产品，就产品的属性来说，它往往具有网络外部性以及共享性。所以，未来的企业发展方向往往都是朝着数字化、信息化的方向发展的。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进行的产业融合，更容易发生数据信息的市场结构垄断。由于数字产品较易复制，所以说在进行固定投资之后，后续的边际成本需要通过销售来获取利润，但是，盗版的出现往往也会对正版软件产生冲击，降低生产商的利润，这就使生产商在发展过程当中，必须依托自身的技术优势来进行产品升级。这也就是说，虽然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进行产业融合，可能会发生生产商垄断的现象，但是，并不代表数据信息没有竞争，往往在这种数字信息的时代，最大的竞争就是创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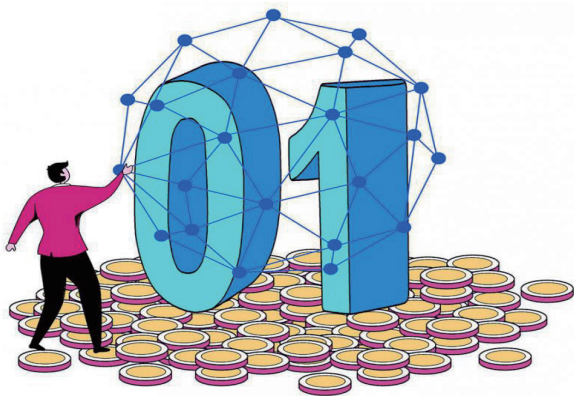
综合以上叙述内容可以知道，数字经济的飞速发展，对于各行各业来说，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它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而从目前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业融合的现状来看，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存在着较大的优势，也可以说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业融合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可以从社会各个层面上对各行各业进行融合度水平的细分，然后深入分析并找出与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存在的差距，进而促进我国各行各业的飞速发展。

(2020年6期 科技经济市场)

数字经济推动 “长三角”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重要引擎作用。当前世界经济受到疫情冲击正在陷入深度衰退，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互融合，以5G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重要推手，并加速向传统产业渗透，未来将催生一大批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

目前，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了全国GDP的1/3左右，未来5年5G商业推广应用，可以直接拉动GDP10万亿，间接拉动GDP25万亿，同时直接创造300万个就业岗位。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数字经济将对未来中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数字经济对“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引擎作用

从2019年的情况看，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总量达到8.6万亿元，占到全国数字经济的28%，而且占当地GDP规模的41%。长三角地区完善的数字经济产业链在这次疫情中经受住了检验。

疫情催生了数字经济，在政府数字化平台建设、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特别是对制造业的渗透实际上极大地释放了经济发展潜力。目前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特别是浙江、江苏、安徽和上海地区各有特色，在全国

数字经济发展中名列前茅，而且未来仍将发挥重要引擎作用。

长三角三省一市各有特色，既有互补，也有竞争

长三角三省一市各有特色。浙江省数字经济以民营企业为主，龙头上市公司发挥了引领作用，海康威视、大华股份、恒生电子都有出色表现，投资人受益匪浅。特别是阿里巴巴在新基建领域里面独领风骚，引领全国数字经济发展。其他省市产业结构也有所不同，比如上海地区，国有企业比重比较大。安徽和江苏在智能制造和消费数字经济方面都有长足发展。总体来看是各具特色，但是有互补，也有相互竞争的地方。

数字经济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有重要意义。首先，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现代化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也有传统农业，在未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数字经济首先会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传统农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劳动生产力大大提升，同时农业市场和服务体系也逐渐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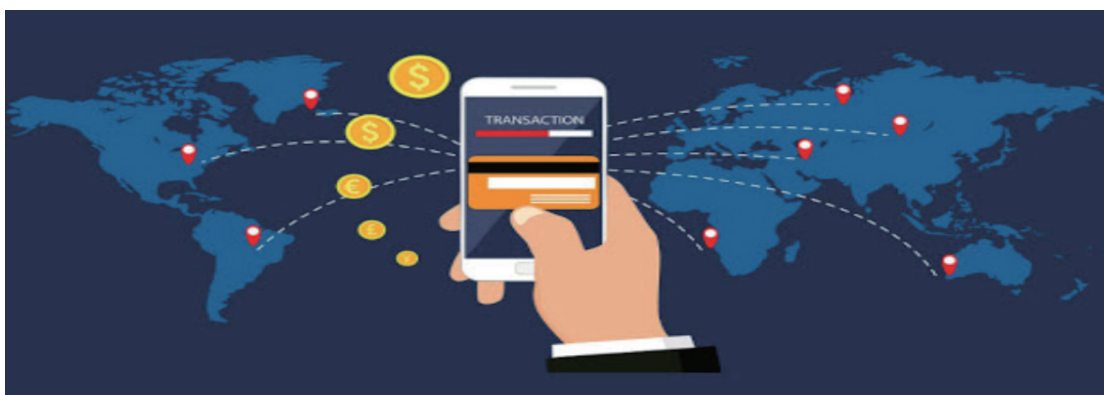
第二，就是智慧城市建设。在城市运营管理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会极大地提升城市运营效率。道路交通的互联互通，还有信息互联互通都至关重要。特别是数字的互联互通，促进了生产要素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自由流动。现代物流体系在这次疫情中让老百姓受益匪浅，通过手机下单送货上门，服务非常到位；通过移动支付，资金得以自由流动；还有健康码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人的自由流动。未来社会保障体制也要统一，这样可以促进人才流动，进一步提升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

从两个方向突破，把握创新、发展主动权

第一个突破口是深化科研体制改革，释放创新潜力。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研发能力非常强，有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大学，像上海交大、同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苏州大学等。这些科研院所的激励机制和内部的治理机制亟待

(下接第8页)

数字经济：在众多 “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



7月23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20年（第十九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云端开幕，大会为期三天，主题是“共迎网络新时代，共创产业新未来”。在开幕论坛上，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田舒斌发表题为《数字经济：在众多“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的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假如回放一下互联网进化的历史性场景，是“数字化生存”的思想启迪了无数人的思维。当年尼葛洛庞帝描绘的场景，曾被认为是无法理解的虚幻或不可能实现的未来，而站在今天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节点上观察和比较，我们会发现，他描绘的一切几乎完整呈现，而很多现实生活中火爆的网络场景也是他没有、也无法预料到的。现实已然超越预测很多，人们可能需要一本新版的“数字化生存”指南。

权威数据表明，疫情背景下中国数字经济增速最快，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中国互联网强劲增长的态势也体现在新华网数字业务上，新华云直播、新华云上学、思客云讲堂、直播场景广告等连接了几何级增长的用户，这从微观上交叉印证了宏观数据。

进一步观察，我们会发现，疫情特殊背景下的信息

消费升级，意味着网络经济的消费场景、消费取向、消费范式已然发生深刻变化。这大多发端于5G+AI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群正掀起的变革。如何看待经济下一程？关键的是准确把握趋势。有观点认为，分析当下趋势，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面对互联网新时代，我们可以说，纵使有千般艰难、万种“不确定性”，中国数字经济的壮阔未来是确定的。因此，最好的选择是审时度势，以变应变，主动选择数字经济及其细分领域确定性的支点，以适应和推动信息技术产业进化，赢得未来。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三点观察：

一、“新基建”将加速应用场景迭代进化

1997年，新华网刚成立的时候，靠得是一根1兆网线联通世界，而现在普通家庭接入的，都已经是千兆光纤。第一部国产GSM制式手机1998年才诞生，而2019年全球出货量前十的智能手机厂商中，国产品牌就已占据了7个位置。可以说，每一次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都带来了需求释放、促进了产业演进。基础设施创造的巨大空间，很快被丰富多样的新应用所消化；新应用的快速普及，又反过来对基础设施提出更高要求。如此这般，便形成迭代升级，良性循环。

当下关注数字经济的未来，必然涉及“新基建”。“钢筋水泥”为代表的传统基建存量基数已很高，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数字型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基建”却处在起步阶段，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为互联网产业的未来摹绘了广阔发展空间。

传播业是数字经济迭代进化的先锋。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新的信息技术总是首先在传媒行业落地，不仅自主找到最直接、最成熟、最广泛的应用场景，也加速了新应用价值扩散的过程。站在5G+AI时代门口，新技术群带来无限可能，而束缚发展的往往是我们的想象力。

科技与传媒深度融合是新华网股份融合发展的核心路径。我们创建了新华媒体创意工场、新华网5G富媒体实验室，着力探索前沿技术在传媒领域的应用。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实验，运用卫星技术遥感影像鸟瞰洪灾现场、展现抗疫进程，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对热点话题、复杂问题的可视化解读，将AI声像分析用在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报道中。从技术筛选、场景策划到模拟测试，再到数据可视化，其实都是在为新的场景应用积累经验、探索通路，因为我们知道，创造新的应用场景就是创造未来。

二、5G将定义常驻云端生存方式

数据显示，中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30.8个小时，较2018年底增加3.2个小时。这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有继续增长的潜力。疫情期间，我们更直观地认识到互联网的不可或缺，人们的工作、生活、娱乐被全方位渗透，唯一的例外就是睡眠时间。所以说，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数字化生存，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

研判5G在传播领域的未来，我认为，5G体系将成为数字经济新引擎，同时在三个维度上推动传播业态的深刻变革：一是从传播的时间维度上看，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常驻云端”的信息环境；二是从传播的空间维度上看，开启新一代的沉浸式体验可能也将成为常态；三是从传播的主体维度上看，我们将真正迎来万物皆媒

的物联网时代。

从随时在线到常驻云端，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生了哪些变化，应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来满足这些需求。要基于浪潮的走向，而不是风口的变换，来推动信息生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筑面向未来的数字化新业态。疫情迫使我们关了许多“门”，但想象空间无限的数字化探索同时也开了不少的“窗”。譬如线下院线一片狼藉的时候，“移动电影院”正开启链接国内影迷、辐射海外市场的“新院线模式”。正是人们生存方式的变化，让数字化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主流形态。

三、跨界融合将是打开未来的正确姿势

在科幻小说中，疯狂科学家的奇思妙想至关重要，而在现实世界，技术进步则来自无数人的不懈探索。特别是在创新扩散的过程中，群体智慧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与反馈推动着技术迭代、缩短了创新周期。

仍然以数字内容产业为例。当下这个时代，信息技术让科技、媒体、通信等行业结合得愈加紧密，发生在通信技术领域的变革，会直接而迅猛地向传播领域传导。传播业在跨界融合方面依然成为先锋。

跨界，不是互相进入彼此的领域，而是共同探索全新的增量空间。新华网相信跨界的力量，致力于积极探索跨界融合的场景。我们与中国一汽集团联合成立了国内首个“车媒体智能生态联合实验室”，共同打造情绪流新闻产品；与阿里云共同投资成立新华智云大数据人工智能科技公司，旨在用智能技术赋能视频内容行业；与中国移动咪咕视讯共同打造融视频栏目《直播联合国》，探索数字内容的新形态。所有这一切，构建了新华网5G富媒体发展的新动能，相信也将成为通信运营商开启新时代的价值要素。

预测数字经济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发现和创造新的应用场景和发展范式。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握机遇，担当责任，“共迎网络新时代，共创产业新未来”，让数字经济迈出加速度、释放新动能！

(2020-7-24 思客)



为什么 土地问题特别值得关注？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一直以来，土地既是原始的生产要素，也是参与财富分配的重要因素，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过往中国城镇化的实践，在不断释放土地价值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土地问题，如割裂的城乡土地市场、城乡土地同地不同权等。新修《土地管理法》，从土地征收补偿、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等方面做出回应，自今年元旦起实施，已有大半年。

同时，在过去的这大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等多个文件，涉及土地要素市场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在新修《土地管理法》中，还有哪些遗憾或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破解城乡土地同地不同权的问题？上述多个文件又透露出未来哪些土改趋势？为此，南风窗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他的300余项科研成果中，三分之一与土地问题有关。此外，作为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过去20年，蔡继明围绕土地制度改革和土地立法，提出了74篇提案、议案和建议，被媒体称为“土地委员”“土地代表”。

争议新修《土地管理法》

南风窗：从2015年开始，国务院就在33个县市区就农村土地征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进行试点。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在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方面，明确规定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的6种情形，其中第5种情形提到“成片开发建设需要”征地，如何避免它成为政府“非公益性征地”的推手？

蔡继明：2019年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首次对征地范围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是当代中国土地征

收制度的一大变革。虽然修正案第四十五条回避了公共利益概念的界定，但对于所列举的六种可以征地的情形中的前四种情形，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时，基本上都没有争议。

对第五种情形，即“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的，则提出了很多质疑，根本原因就是担心，前面被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四种情形排除在征地范围之外的土地，又会被地方政府以“成片开发建设需要”名义“合法”征收。果真如此，这次《土地管理法》修正所取得的征地制度改革成果就前功尽弃了。

既然这个在征地范围方面带有很大争议条款的新法已通过并即将在全国实施，那么，在实施条例中准确界定“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的内涵和标准就至关重要了。我认为，可以把“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界定为“公共利益与非公共利益在空间和功能上不能隔离但以公共利益的为主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具体的标准有六条：

- 1) 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而村集体无力改善，工商企业又无意投资的城中村或城郊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或城市更新建设需要；
- 2) 对老旧废弃厂房和基础设施落后集中村集体无力改善，工商企业又无意投资的工业园区改造建设需要；
- 3) 公共利益项目与非公共利益项目难以分割且公共利益项目占60%以上的建设需要；
- 4) 通过政府征收和成片开发实现的公共利益大于由此对农村集体造成的损失而进行建设的需要；
- 5) 对集体财产的损失、工程造价和可能存在的社会不利因素或其他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失不超过政府征收和成片开发所带来的利益；
- 6) 由权威的中介机构参与评估确认公共利益属性超过60%，并通过民意调查和听证会得到拟成片开发区内公众80%以上认可的建设用地需要。

南风窗：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为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撕开了一个口子，未来还有哪些可继续拓展的空间？

蔡继明：《修正案》删除了原法第四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的规定，并将第六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修改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建设用地，土地所有权人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这就打破了政府对城市建设用地的独家卖方垄断，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一个口子，朝着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然而，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多达19万平方公里，是城镇建设用地的2倍以上，《修正案》所允许入市的所谓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仅占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14%，且基本都已在使用中。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中70%以上是宅基地，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落户，很多宅基地处在闲置状态。只有允许这些大量闲置的宅基地入市，才能构建起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使土地资源按照人口的流动和市场的需要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

我认为，要放宽对农地入市的限制，只要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而且非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即使是耕地也应该允许改变用途直接入市，更不要说本身就是建设用地或宅基地了。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房屋。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允许县级政府优化村庄用地布局，有效利用乡村零星分散存量建设用地，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推动城中村、城边村、村级工业园等可连片开发区域土地依法合规整治入市，显然就是对“经营性建设用地”概念的突破。

城乡土地如何实现同地同权？

南风窗：同为宅基地，城乡居民在宅基地权利上却有所不同，城市居民拥有宅基地的完整用益物权，村民只有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如何实现城乡宅基地的同地同权？

蔡继明：我国城乡宅基地同地不同权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城市居民对国有住宅建设用地具有收益权，也就是可以连同住宅出租、转让以获得财产性收入；而农村居民对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只有使用权，不能出租转让，这就基本堵塞了农村居民获取财产收入的渠道。其二，城市居民对国有住宅建设用地具有担保物权，可

以用宅基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进行融资；而农村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使用权不具有担保物权，不能以其抵押贷款，这就基本堵塞了农民融资的渠道。

其三，使用国有住宅建设用地的城市居民可以一户多宅、面积不限，国有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出租、转让给任何人（甚至外国人）。而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宅后，不允许申请宅基地，农村集体宅基地使用权退还给集体或在本村内转让，不准流转给城市居民。

要彻底改变上述城乡宅基地同地不同权的状况，必须修改《民法典·物权编》和《担保法》，赋予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与城市国有土地产权同等的权能，包括允许集体土地所有权人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赋予农村住宅建设用地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村与村和城乡之间流转，允许城镇居民到农村买房租房和租地建房，允许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推进城中村的改造，让小产权房与大产权房平等进入房地产市场。



南风窗：今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土地被列为需要市场化配置的七大要素之首，足见其在整个要素市场体系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但现实是，我国人口和土地的空间配置存在着严重错位，如何才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蔡继明：首先要破除土地资源例外论。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一些官员和学者则强调土地资源的特殊性，其配置不能由市场决定，而应该由规划和用途管制决定。这显然是对中央改革精神的误读和曲解。

2019年修正的《土地管理法》仍然保留了第四条“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规定土地用途”“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第二十条“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确定每一块土地的用途”；第七十五条、七十九条、

八十条的条款：不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使用土地，就要按违法用地处置。如果政府把村庄的每一块土地的用途都规划好了，还有市场发挥作用的空间吗？

检索一下《土地管理法》（2019 修正版），你会发现全文有 100 处提到“规划”，17 处提到“行政”，31 处提到“管理”，17 处提到“计划”，更遑论“市场配置资源”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足见国土资源管理中计划经济思想的根深蒂固。应该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彻底否定了“土地资源例外论”，为实现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解除了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禁锢。

其次，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担保物法》等涉地法律法规和政策，把“土地资源配置同样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写入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再次，对土地利用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之外的空间则完全交由市场配置；取消对特大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和土地减量发展的要求，根据城镇常住人口的规模相应增加建设用地的供给。最后，取消全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周转年度指标，允许增减挂钩指标在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进行交易。

下一轮土改的方向

南风窗：土地问题的确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当代中国曾进行多次“土改”，你能否先给我们回顾和总结一下以往的土改都解决了哪些主要问题？

蔡继明：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我国前后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土地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土改）：一次土改（1949）赋予了农民土地私有权；二次土改（1962）事实上建立了农地集体所有制；三次土改（1982）完成了城市土地国有化；四次土改（1984）实现了集体土地两权分离；五次土改（1988）实现了国有土地两权分离。

前三次土改发生在建国后的 30 年计划经济时期，旨在完成由土地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后两次发生在建国后的 40 年改革开放初期，旨在实现公有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所谓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三权分置只是对使用权的权能做了进一步分解，本质上并没有超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两权分离的属性，故没有将它们作为独立的一次土改与其他五次土改并列。

上述五次土改虽然在各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不同程度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形成现行土地制度的两大弊端：

其一，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具体表现为农村集体土地没有发展权，农村宅基地没有

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农村集体土地只有被征收为国有土地才能用于非农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这种产权安排剥夺了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增值的权利，堵塞了农民获取土地财产收入和融资渠道，激化了政府与农民的矛盾，同时使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造成严重的土地腐败。

其二，政府的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完全取代了市场配置，其结果是建设用地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城镇建设用地在地区间、城市间配置失衡，城镇建设用地在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利用结构上配置失衡。这种土地资源的计划配置阻碍了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一方面影响了城市化进程特别是特大超大城市的发展，由此造成的高房价抑制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制约了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南风窗：在你看来，新时期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下一轮土改重点要解决什么问题？

蔡继明：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看一看中共中央、国务院近半年来频繁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和信息：

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0 年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2020 年 6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强调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要积极探索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的具体路径和办法；2020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

从这些文件和信息中不难确定，新时期土地的方向就是要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的同权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重点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尽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放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限制，增加城市住宅建设用地有效供给，通过降低地价而降低房价，从而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的门槛，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同时消除房奴效应，释放城市居民消费潜力，有效扩大内需，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取消对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限制和土地减量发展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趋势

面临着“十四五”时期的特殊背景之下，我国应从找准战略、简政放权、强化监管等方面入手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我国应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之下，进行轻重工业、农业、服务业等的上升式调整过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以2016年为开端，进行初步产业类型改善与调整。自2020年后的十五年，是产业结构调整突飞猛进阶段。直至2035年之后，产业结构发展逐渐出现平稳运行之势。



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中长期趋势的特征

自2020年之后的三十年，我国将长期处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在这一时期，农业、渔业、畜牧业等传统产业的生产模式需要进行转变，这类产业中的

的要求，破除城市建设用地人均100平方米的清规戒律，充分发挥大城市（包括特大和超大）和城市群在吸收外来人口提高全国城市化水平方面的主力军作用，让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适应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需要。

其三，赋予农村土地发展权，特别是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的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盘活农村大量闲置

待业人员在逐年减少，而且这类传统产业对于国民经济总量的贡献，也在逐年的下降。再者，如采矿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的劳动人员的数量占比也在不断下降中。高科技信息产业则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大量吸纳核心技术，引进高端人才，大力推动人民收入的增长，且生产效率相对较高。传统工业逐渐失去优势，更多占据最佳位置的是第三产业。我国正在以科学合理的手段逐渐转变产业发展的重心，实现由重视重工业到重视现代科技的转变。

在新型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之下，我国国民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合理利用原本优势，淘汰原有的劣势。汽车、电子、金融等行业逐渐崛起，占据我国市场的一席之地。这类第三产业，着重发挥了自身的技术优势，重视产业结构的合理性，企业管控经营措施到位。而且，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之下，仍旧蓬勃发展的产业，大多就已经形成较为专业化的产业链，注重配套生产。同时，企业会互相带动生产，在竞争与合作中发展生存。

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因素

（一）工业改革与技术创新并行发展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技术结合改革将会成为有效促进产业调整的核心要素，来适应现有的形势。工业改革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在工业改革中也涌现出一批高学历且拥有较高的技术和素质水平，兢兢业业

的宅基地，消除阻碍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对小产权房分类治理，允许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小产权房合法化，允许城中村在不改变集体土地产权属性的前提下自主改造，拓宽农民获得财产收入的渠道，构建农村脱贫的长效机制。

（2020年18期 南风窗）

的为我国智能化、信息化产业发展道路收集经验的杰出人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的正是一批敢为人先的高端人才和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工业革命时代可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但是为了维护我国经济在平稳中前进，我国应重视起工业的转型与改革。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应坚持以提高生产力为原则进行结构调整。同时，我国实现从基础的人工到智能制造的转变，工业的实例空前增强2019年工业增加值已经接近28万亿元。由于工业长期保持较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在世界中的份额开始逐渐扩大，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多年稳居世界第一，造就了中国经济总量名次稳居前列的优秀成果。

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力变革，也在逐渐改变我国的三类产业的资源配置比重。由最初的移动通信、大数据延伸到现在的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等生产生活方式变革，这些新生活方式都是技术主导环境下的最佳表现成果。

（二）国家政策大力扶持

我国始终围绕加强资源优化、提高国民收入、调整经济结构，坚持向着高质量制造业方向发展。国家已及时调整各类产业的战略导向和政策实施方式。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深度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力扶植下，老工业基地变迁改造，进一步增强竞争力；民营钻机制制造业逐步发展起来，为我国人才就业和增强创新能力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国不断引进外商投资，优化产业的内部结构，有利于我国产业的总体生产水平的大力提高，为企业节约大量生产成本。经济的快速增长，由主要的第二产业带动转换为信息技术产业优先发展带动。自1978年直至今日，依靠高科技的信息产业链已基本形成，服务业等行业对于我国经济收入的贡献在逐年增大。如煤矿企业转型成为电子产品制造企业，工人重新获得更高效的工作岗位。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提升传统的工业产量。部分制造企业已经实现自动化生产，且工厂机器设备和各部门人员都以优质资源为主。

三、“十四五”时期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思路

在“十四五”发展规划期内，我国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经济和民生挑战。因此政府应正确处理好自身与市场、人民之间的关系，重点克服内部矛盾和外部困难，合理配置资源，从而更加平稳的拉动经济收入的增长，保障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坚持技术至上，走向创新驱动

为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政

府应重视起技术至上的理念，创造一批高技术层次的企业。“十四五”时期，为优化产业发展状态，应以创新技术作为基石，来重点突出产能优势，增长经济效益。我国长期处在供给力不足、创新能力差的状况下，这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产业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同时，我国应坚持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以此来营造出和谐的产业发展环境，而不是将产业发展陷入到结构混乱的困境中来。

产业的优化应着重发挥技术的力量，不论是管理经营，或是生产制造，都应依靠技术作为运营的支撑和判断标准。如智能机器人、VR技术、智能化城市等，都有技术作为基本支柱。倘若不考虑技术的优势，各类产业发展都会因此停滞不前。企业在缺少创新意识的前提下，是不利于后期进行行业的改善与升级准备的。产业处在较快节奏的发展状态之下，应多吸取外部技术与经验，进一步总结出自身的发展潜能，从而专注创新，提高技术力量。同时，我国产业面临着严峻的环境，也应保持自信心，但不可过度自信。目前，全球有128个国家与我国建立起科技合作。

（二）解决生产能力过剩，划分好政府与市场的分界线

生产能力过剩，是由价格、市场需求、政策实施等多方原因共同构成的。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生产成本的变化以及未来的企业发展方向是否变化等，都与生产能力的多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像一些监测不到位、非法包庇企业、低价供地等行为，都会一定程度上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经济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主要来源于旺盛的需求和质量约束。我国企业在发展中应积极重视起群众的需求，在市场准入环境下，以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多样化产品为主要目标。解决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情况而定而不是盲目学习西方。

我国不可大量削减重工业，而是应该促进此类行业的转型，保证国民经济收入不再下降，保证就业岗位不再缺少以此来释放第一产业的能力，结合第三产业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对于一些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国家不可强制要求其关门，应该考虑该企业自身的优势，给与一些机器设备和技术上的支持，以促进后期的转型调整为主。最后，政府与企业应该自觉明确自身的职能，政府不可过度干预市场，市场也不可随意变化，以防止形成不良的产业结构，埋下产业后期升级的隐患。

（三）发展先进的制造业，坚持供给侧结构改革

随着5G技术、卫星导航等技术的逐步运行，将为社

盐城枢纽变身记

盐城，江苏中部沿海因盐而兴的城市，自古以来就是经济重镇。可是，在铁路盛宴上，盐城却是后来者。一直到2005年4月，新长铁路开通运营，盐城才首次与铁路结缘。此后一发不可收拾，青盐、徐宿淮盐、盐通、盐泰锡常宜铁路纷至沓来，盐城不经意间已成国家铁路沿海大通道上的关键节点、苏北沿海重要铁路枢纽。



煮海为盐

古代，淮河以南、黄海之滨的盐城一带属于淮南盐场。这里有平坦的滩涂，茂盛的芦苇、茅草，可为煮盐提供大量燃料。汉武帝时，设置盐渎县，那时候盐城还是一

个长160里的海中沙洲，沙洲上有123座盐亭。县城是土筑的城墙，西面窄，东面宽，就像一个葫芦瓢。盐渎这个县名用了500多年，到东晋的时候改为盐城，沿用至今。

隋朝前，人们直接舀海水煮盐，效率不高，产量也低，后来用刮土的办法，把一大片浸透了海水的滩涂刮平，撒上草木灰吸咸水，冲淋后提取卤水，然后用莲子扔进卤水中，莲子不下沉，就说明浓度高，可以熬制了。

唐朝实行榷盐法之后，食盐纳入国家专卖渠道，宫廷衣食、百官俸禄、军饷粮草都靠盐税开支。那时候的盐城是“纳税大户”，年产盐105万石，超过7万吨，贡献了国家盐税的四分之一。

宋元以来，盐城制盐业愈加兴旺。北宋时范仲淹带领民工沿着海岸线筑了一条大堤——范公堤。大堤西侧，利用取土留下的洼地，开挖了一条平行于大堤的串场河。一条旱路，一条水路，构成了那个时候盐城的交通大动脉。

堤东是盐场，灶火炽烈、炊烟袅袅，堤西是良田，麦苗吐翠、稻花飘香。堤岸遍植柳树，春景最绚烂迷人，桃花灼灼，柳枝婆娑，清朝一位画家路过时感叹：“柳眼凝烟眠晓日，桃腮含雨笑春风”。串场河里，运盐的木船首尾相接，绵延数十里，一池碧水映照着云朵，夹

会提升专业化、精细化服务。先进制造业重视产业运行的生命周期，坚持智能化、自动化原则的新型制造业。我国应形成一批创新活跃、效益显著、质量活跃、带动效应突出的深度融合的现代化制造业。我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应坚持以发展绿色生态、智能生态、创新生态为主要标准，对于一些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的应用，要及早的推行开来。同时，我国的产业应重视发展共享平台，利用网络通信技术，提高总的集成水平、总生命承包水平，加强全生命周期管理。除此之外，我国应大力坚持供给侧结构改革，加快新旧产能之间的相互转换。针对大型制造工厂的生产线，可向

着智能化方向进展，解决人力成本上升、订单总量下滑的基本问题。我国目前的先进制造业包括海洋工程设备、航空装备、微纳制造等。

中国应坚持科技体制改革，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地位，不断突破瓶颈，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利用高科技技术来转变产业结构。同时，我国也应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十四五”时期，更应积极的去优化创新环境，坚持发展信息技术，坚持走深、走实，以高技术水平优势带动各大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达到为人民谋福利的目的。

(2020年23期 商情)

岸葱茏点缀着白帆。

范公堤和串场河是盐城的经济线、风景线、文化线，沿线的盐场，有的逐渐形成县城，如东台、阜宁，有的形成古镇，如草堰、白驹、刘庄、伍佑、上冈等。

范公堤给盐城带来的福祉，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条纵贯盐城市南北的204国道，从阜宁到东台富安那一段路基，正是利用了范公堤。想了解当初范公堤是什么样子，去大丰草堰镇还能看到一段原汁原味的千年古堤。204国道的终点，是上海人民广场，让人感觉古老的盐城焕发了青春，正穿越时空，顺着范公堤向大上海奔去。

梦回江南

在盐城，许多人至今都把睡觉叫作“上苏州”或“上虎丘”。这是怎么回事？时光还需回溯到元末明初。历经战乱，苏北人口损失非常大，盐城海边盐场成为一片旷野，走很远都看不到一个村庄，更别提大户人家了。朔风吹拂着枯芦苇，更让人觉得凄凉。

而元朝末年苏州有人口200多万，于是大批民户被迁往苏北，史称“洪武赶散”。当时，移民是从苏州阊门运河码头上船的，阊门，就成了移民后裔心目中的“大槐树”。几百年来，祖祖辈辈传下话来，说他们的祖上来自梦幻般的阊门，那里行人如织、货积如山、船帆如云、黄金百万。

盐城与上海的缘分更是不浅。淮剧本是起源于盐城淮安一带的民间小戏，一场大水灾，使得许多盐城人背井离乡，沿京杭大运河来到苏南和上海，淮剧也在上海生根开花。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陈毅任代军长，率领部队转战盐阜大地，陈毅对盐城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充满了感情。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首任市长，当时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无法安置，陈毅一下子就想到了盐城，那里有广袤的滩涂原野，去多少人都容纳得下。于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与苏北人民政府商定，在当时的台北县（今盐城市大丰区）以四岔河为中心，划出20万亩国有荒地给上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有8万多上海知识青年从十六铺码头乘船到南通，又换乘长途汽车，颠簸大半天，来到位于大丰滩涂的上海农场、海丰农场落户。

因为这块拥有上海户口的“飞地”，如今，许多人把整个大丰都亲切地称为“北上海”。昔日滩涂荒地，已经发展成占地达307平方公里的现代化农场，这里稻谷满仓、鱼虾满塘，成为上海的菜篮子、米袋子、肉盘子、

鱼池子。上海市场二成粮食、四成猪肉和三成淡水鱼均产自大丰上海农场，整个盐城，每年销往上海的农副产品超过500亿元。

枢纽告竣

盐城与上海，磁石般吸引，有一种特别的渊源，不仅体现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宏大叙事中，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细节中。上海食品、上海电器、上海服饰、上海口音、上海腔调、上海时尚已经融入盐城的毛细血管。在上海，原籍为盐城的新上海人有30万人，青春往事中带着“大丰记忆”的上海人也是数以万计，而对那些姻缘一线牵的两地有情人来说，上海与盐城上演的是一场血肉凝结成的“双城记”。

然而，盐城去上海，300多公里的路程，并非那么顺畅。204国道尽管直通上海，但是有长江阻隔，到了南通只能通过通沙汽渡才能过江。1999年和2008年，江阴大桥、苏通大桥相继建成通车，进一步拉近了上海与盐城的时空距离，但是，不堵车情况下至少三个小时车程，与两地人民的迫切期待，还有距离。

打造沪盐一小时交通圈，还需要铁路担纲。在盐城建造铁路的设想，最早出现在孙中山完成于1919年的《建国方略》中。他计划以盐城海边的新洋港为起点，建造一条东西向的铁路干线，经盐城一路向西，跨越大纵湖至淮安，最终到达汉口。可惜这个宏大计划在旧中国没有办法实现。

2005年4月，新长铁路开通运营，古老盐都首次响起汽笛声。如果乘火车去苏锡常或上海，可以在盐城站上车，沿着范公堤的轨迹一路向南，到了海安转向宁启铁路，大约4个小时才能到南京站，再从南京站换乘沪宁线列车前往苏州、上海。这一路下来，起码需要五六个小时。

2018年1月，时速350公里标准的盐通高铁开建，目前已全线铺轨，2020年底将通车运营。届时，从盐城出发的高铁，不用去南京绕路了，可走最近路线，经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过江，理论上一个小时可以到上海站。

至此，从渤海湾到长三角、珠三角的国家沿海铁路大通道已经彻底打通。盐城也成为铁路枢纽，拥有多个方向的铁路线。往北有青盐铁路，往西有徐宿淮盐铁路，往南有新长铁路和盐通高铁。未来，还有盐泰锡常宜铁路，在江阴通过公铁大桥过江，直插太湖西岸。搭上复兴号的古老盐都，将进一步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大潮。

（2020年17期 瞭望东方周刊）